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区域及阶段性差异^{*}

——基于广州、长沙、柳州三地的实证研究

雷 洪 胡书芝

摘要 :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认同上存在区域性差异和阶段性差异,在区域分布上,移民家庭的的城市认同呈现中小城市(长沙、柳州)认同度高于发达城市(广州)的层次性特征;在进城时间分布上,移民家庭的的城市认同呈现进城时间越长认同度越高的阶段性特征。促进乡城移民家庭的有效城市融入,应从时间上的稳定居留和空间上的就近就业角度考虑,以此提升乡城移民家庭的的城市认同及城市化质量。

关键词 :乡城移民家庭 城市认同 区域 阶段性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4)03-0095-06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乡-城迁移活动已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越来越多的乡城移民开始从“流动”转向“移居”,从单枪匹马外出转为举家外迁,这是我国城市化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如何能够在城市稳定就业、落户、认同和融入。在乡城移民家庭式迁移越来越普遍的当下,移民家庭的的城市认同是实现乡城移民家庭融入城市和提升我国城市化质量的必要前提,这成为当前以及未来我国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一、文献回顾及资料来源

有关乡城移民的城市认同问题,国内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总的来看,学者们主要探讨了乡城移民城市认同的基本状况、特征及其影响因

素。唐斌用“双重边缘人”概念描述了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状况,认为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双重外推力是其认同困境产生的原因。^[1]郭星华、邢朝国、杨健、李辉等认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不是单维度线性的,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与城市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褚荣伟、肖志国等发现农民工的经济、文化、社会融合程度越高,他们对城市的认同程度就越高,也会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3]

除了上述研究,还有部分学者从地域分布或年龄分布上对乡城移民的城市认同进行了特征归纳。在地域分布方面,蔡禾、曹志刚、王兴周等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多个城市的调查,构建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的模型,提出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受自身市场能力、相关制度设置、户籍所在地甚至城市生活实践等因素的影响。^[4]景晓芬、马凤鸣利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

工城市认同的差异。^[6]

在年龄分布方面,部分学者专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进行了分析。如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主观上更倾向于在城市长期居住,但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危机不利于其市民化进程^{[6][7]}。王春光等在对两代农民工城市认同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并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就越强。^{[6][9]}对此,李培林、田丰也通过描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和身份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城市认同上并没有根本差异。^[10]

通过梳理,我们发现以往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缺少对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研究,多数研究的关注对象是乡城移民个体,个体城市认同的结论难以对家庭城市认同形成有效的解释力;二是缺乏地域比较分析,在少量关于特定地域乡城移民城市认同的研究上,所选地点同质性较强,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进行区域比较的研究并不多见,难以发现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区域的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层次性特征;三是缺乏进城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多数研究比较了不同年龄段乡城移民城市认同的差异,难以发现时代变迁中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阶段特征。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进城时间两方面来分析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共性与差异,以期寻找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特征。

本研究所用数据资料是笔者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农民工家庭的融入进程与变动规律”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城移民家庭居住获得机制的社会学研究”问卷调查的相关数据。该调查于 2012 年 7 月至 8 月在广州、长沙和柳州三地进行,通过多阶段抽样在每个城市抽取了 9 个街道 18 个社区 320 户乡城移民家庭。在所

抽中的每户家庭中,选取 1 人(家庭的代表)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最终的问卷填答。三个城市共计发放 960 份家庭问卷(每城市 320 份),其中广州回收有效家庭卷 301 份,长沙回收有效家庭卷 303 份,柳州回收有效家庭卷 296 份,共计回收有效家庭卷 900 份,有效回收率达 93.7%。

二、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基本状况

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认同,以情感反应为基础,以城市归属、身份认同等为最终体现,是乡城移民家庭成员对城市人群、环境的肯定、趋同以及融入归属。首先,在情感反应上,城市认同主要表现为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整体满意状况和喜爱程度。移民对城市的情感加深,有利于其心理认同和归属感的形成,但城市认同仅仅停留于对所生活城市的满意和喜爱远远不够,最终还需要通过乡城移民家庭的归属、认同感及明确的城市生活预期等一系列指标来体现。为此,本研究从乡城移民家庭的归属、城市归属及城市定居意愿三个方面来考察其城市认同问题。

1. 城市情感

所谓城市情感,是指乡城移民家庭对其所生活城市所持有的特定情感认知,是移民家庭在自身和城市人群、城市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评价与体验,这主要从移民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评价和对城市的喜爱程度来体现。作为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中的一种积极的生活体验与感受,城市情感有利于乡城移民家庭形成较为积极的城市认同与归属。本研究发现:乡城移民家庭对全家生活在城市满意的只有 19.7%,但表示喜欢所在城市的家庭却有 49.2%(见表 1)。可见,乡城移民家庭城市生活满意度虽不是很高,但他们对所生活城市的喜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2. 城市归属

群体归属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传统社会

中,先赋因素往往占主导地位,成员一旦获得某种群体身份,相当稳固。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市场发展、社会流动加剧等,职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文化和身份,成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识。乡城移民家庭成员职业、生活环境等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其群体归属问题。城市归属不仅是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程度的重要表现和参照,也是影响城市社会稳定与整合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被调查者中,认为家庭成员与城市居民有区别的只有 18.7%;感觉在城里低人一等的家庭有 11.7%(见表 1)。可见,虽然有少量家庭城市归属感比较低,但也有相当比例的家庭对城市群体归属的认知度比较高。

3. 定居意愿

生活安排、发展规划及定居决策是体现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度高低的指标。乡城移民家庭进城动机千差万别,有的是为了务工赚钱后再“卸甲归田”,而有的则是因为向往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相对较好的生活质量。研究发现,认为全家生活在城市困难的家庭有 59.8%,但打算将来在城市长期工作、生活的家庭有 37.8%(见表 1)。可见,虽然乡城移民家庭在融入城市问题上存在诸多困难,但仍有不少家庭打算定居城市。

三、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融入的区域差异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

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农村劳动力迁移地区分布特点看,发达地区活跃的经济环境成为吸引乡城移民家庭进城的强劲拉力,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是流动人口主要输出地,而东部地区则是流动人口主要输入地。乡城移民(家庭)跨区域迁移,有利于经济发展。对输出地来说,有效地增加了移民家庭的收入;对输入地来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流入促进了该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但是,乡城移民家庭进入城市,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的解体以及生活世界的重建,在不同规模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政策环境各有不同,地区文化也五彩缤纷,多方位因素形成的针对乡城移民家庭的“社会排斥——接纳——融入”可能也会有程度之别,由此可能影响到乡城移民家庭的认同度。本研究经过对三个地区的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度的单一方差分析发现:生活在柳州的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度最高(均值为 44.28 分),生活在长沙的移民家庭次之(均值为 43.56 分),生活在广州的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度最低(均值为 39.84),乡城移民家庭的认同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见表 2)。

当下中国乡城移民家庭虽然主要只是在国内不同地区间迁移,但他们面对的区域文化、制度、经济等差异也是比较明显的,本研究中广州、长沙和柳州三地乡城移民家庭的认同度有高低之分,

表 1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基本状况(%)

	城市认同指标	不符合	一般	符合
城市情感	全家生活在城里比较满意	42.6	37.7	19.7
	家人比较喜欢这个城市	10.6	41.1	48.3
身份归属	还是典型农村人	37.7	31.5	31.1
	家人与城里人没区别	44.7	36.6	18.7
	家人在城里低人一等	61.4	26.9	11.7
定居意愿	全家定居城市困难	16.9	23.3	59.8
	全家准备长期生活在城市	30.9	31.4	37.7

表 2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区域差异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平方和	均方	F	Sig.
长沙	303	43.56	6.48	0.37	组间	3366.24	1683.12	38.754	0.000
柳州	296	44.28	6.52	0.38	组内	38609.95	43.43		
广州	301	39.84	6.77	0.39	总数	41976.19			

可能与这三个地方的区域环境差异有一定关联。

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三个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为明显。广州地处发达地区,收入水平较高,但各方面消费水平也高。比如移民家庭关心的住房消费,高昂的房价使得乡城移民家庭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负担都相当重,多数移民家庭无奈之下只有选择居住在城中村,邻里基本都是外来人口,同质性很高,生活圈子与城市居民并没有太多交集。而在柳州这类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中,多数乡城移民家庭就近迁移就业,工资水平虽低于沿海地区,但与城市居民处于同一个竞争环境中,且消费也普遍较低,生活压力要小于在发达城市生活的家庭。

从文化冲突上看,三个城市中,广州的跨省迁移家庭最多,而长沙和柳州的乡城移民家庭主要是省内迁移,尤其是柳州,近 7 成是省内迁移,且主要来自柳州辖区之内,或辖区外靠近柳州的地方,跨省迁移和省内远距离迁移家庭都不多。本研究发现,跨省迁移家庭的城市认同度(均值为 41.92 分)明显低于省内迁移的移民家庭(均值为 43.02 分)(见表 3)。究其原因,跨省迁移和省内迁移面临的文化差异是不同的,比如语言、习俗等。相对于广州,生活于柳州的乡城移民家庭在近距离迁移中,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都不存在障碍,

文化差异对其冲击不大。

从心理距离上看,以跨省迁移为主的广州,乡城移民家庭容易产生身处他乡的漂泊感,城市归属感不易形成,而长沙和柳州的移民家庭中就近就业的家庭较多,不存在漂泊他乡的孤独感。在跨文化接触过程中,迁移者如果没有或较少产生抑郁、孤独、失望等负面情绪,就算达至心理融入。^[1]因此,近距离迁移的移民家庭,因为心理上的安全感,其对生活地也容易产生较为积极的认知和评价。

四、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阶段性和差异

不同时期的进城家庭,其在城市认同上也可能存在差别。在迁移实践中,部分家庭是夫、妻先后进入城市,为此,本研究对夫妻进城时间进行了处理,换算出夫妻共同生活在城市的时间,以共同城市生活时间来考察不同家庭的认同阶段性特征。本研究把移民家庭的进城时间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为 5 年及以下、6~10 年、10 年以上,以此为标准来进行各阶段城市认同水平的比较。研究发现,进城时间在 10 年以上的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度最高(均值得分为 43.44 分),进城时间在 6~10 年的家庭次之(均值得分为 42.78 分),进城 5 年及以下的家庭城市认同度最低(均

表 3 跨省迁移家庭与省内迁移家庭城市认同差异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样本描述				方差齐性检验		独立样本 T 检验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F	Sig.	T	Sig.
跨省迁移	377	41.92	6.958	0.358	0.091	0.763	-2.383	0.017
省内迁移	515	43.02	6.763	0.298				

值得分为 41.89 分)(见表 4)。

可见,乡城移民家庭城市共同居住时间也是考察其城市认同时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其城市认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并呈现进城时间越长、城市认同度越高的基本特征。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移民家庭自身经历、体验及所处时代背景等因素有关。

从乡城移民家庭自身因素看,乡城移民家庭在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积累有利于形成城市认同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表明,移民的人力资本(如语言、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劳动技能等)与社会资本(如社会关系网)对促进移民的城市适应、城市认同与归属感乃至留城定居,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城移民家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家庭中个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存量,在其形成城市认同中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乡城移民家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改变。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居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积累有利于城市生活的劳动经验、语言、技能等新的人力资本,同时也会在长期的城市生活中逐渐突破原有社会资本的限制,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重新构建起新的社会资本。这些日积月累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是促进其城市适应、城市认同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从乡城移民政策变迁的角度看,我国针对乡城移民的诸项政策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时代变迁,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与体验可能也会随之发生变

化。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允许农民进城,但当时城市各项配套政策都还不完善,比如户籍的限制相对较严格,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等,早期进城家庭遭遇的城市排斥比较明显。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国家政策对乡城移民家庭越来越关注,乡城移民家庭逐步能够享受到城市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等多项福利待遇。早期进城家庭见证着城市对乡城移民群体的诸项政策日渐完善,能够感受到城市对其接纳的过程,也就容易对生活在城市产生信心,这有利于其城市认同感的形成。

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认同上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城市认同与进城时间有很大关联,是不断递进的过程,移民家庭进城时间越短,城市认同度越低,进入城市时间越长,城市认同度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发现了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在时间上的阶段性差异——进城时间越长城市认同度越高;以及城市认同在不同城市的区域性差异——对中小城市的城市认同度高于对发达城市的认同度。真正的城市化是乡城移民能够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并真正成为城市市民,而非仅仅把城市作为暂时落脚点或挣钱地,最后不得不开城市。结合上文分析,本研究认为有以下内容可以进一步讨论。

首先,通过比较不同进城时间的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发现乡城移民家庭的城市认同是有阶段性的。当移民在城市生活时间逐渐延长,其城市认

表 4 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描述性统计					单一方差分析			
	N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平方和	均方	F	显著性
1~5 年	385	41.89	6.45	0.33	组间	351.72	175.86	3.756	0.024
6~10 年	290	42.78	6.83	0.40	组内	41624.48	46.82		
10 年以上	217	43.44	7.51	0.51	总数	41976.19			

同感会逐步提升,这无疑有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乡城流动持续高涨的情况下,如何使乡城移民家庭在城市稳定工作与生活,是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与建设所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其次,乡城移民家庭城市认同的地域层次性规律凸显迁移策略的重要性。本研究调查的三个城市,实际上代表了三种经济发展类型。其中,广州属于经济较发达、跨省乡城移民家庭比较密集的沿海城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内相当一部分发达大城市的乡城移民家庭情况;长沙属经济中等发达的城市,乡城移民家庭以省内迁移为主,基本能代表国内中等发达城市的乡城移民家庭情况;柳州处于中国西南,与沿海城市和内地省会城市相比,经济辐射力相对较弱,乡城移民家庭以柳州市周边地区农村人口为主,基本上代表了中小城市的一般特征。比较发现,中小城市的乡城移民家庭,其城市认同感反而越强。费孝通老先生曾提出,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路:“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井”的小城镇建设道路。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战略对当前中国即将大规模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有着极强的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加快小城镇建设,让乡城移民家庭在家乡附近的城镇“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进而在较高的城市认同感中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向。

注释:

- [1] 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S1期。
- [2] 郭星华、邢朝国:《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图式——以北京市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研究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 褚荣伟、肖志国、张晓冬:《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及对城市感知关系的影响——基于上海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2年第1期。

[4] 蔡禾、曹志刚:《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 景晓芬、马凤鸣:《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南方人口》,2012年第3期。

[6] 何绍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9期。

[7] 何明洁:《劳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感形成》,《软科学》,2012年第8期。

[8]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9] 何军:《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6期。

[10]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

[11] 陈慧、车宏生:《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3年第11期。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农民工家庭的融入进程与变动规律——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的理论视角”(10YJC840032)、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乡城移民家庭居住获得机制的社会学研究”(12CSH02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12YBB163)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雷洪,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4;胡书芝,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湖南师范大学讲师,湖北武汉 430074。

(责任编辑:羽林)